

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 到创新社会主义发展

——以俄国和中国为例

吴荣军

内容提要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据。从历史检视看,中俄两国都发展出了本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方法,前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后者是新经济政策。但在俄国,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共领导人背离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键词 资本主义 生产力 社会主义

吴荣军,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25009

1917年后的俄国和1949年后的中国,其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国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如何在两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两国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分别探索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来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但可惜的是,俄国在列宁逝世后便放弃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道路,苏联更是于1990年解体蜕变,而唯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坚持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并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一、方法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启示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制度更替过程中,人类社会一般将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序依次更替和演进。但社会制度更替中也存在着特殊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曾经论述过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在马克思看来,跨越这一峡谷,需要具备国内和国

[1]冯景源:《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福州〕《东南学术》2009年第4期。

际两个历史条件。

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存在是跨越的国内条件。第一,由于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时代,因此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改造俄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1]第二,俄国农村公社处在资本主义陷入深刻危机、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时代,这给农村公社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契机。因此,“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农业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2]。

跨越的国际条件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在其帮助下才能实现。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在不断积累,但另一方面,一部分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对于这种情形,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还是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第一,“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3]也就是说,只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前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可以借助这些国家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并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最终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第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为东方落后国家提供榜样。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他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4]在恩格斯看来,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由此来看,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跨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跨越,因而属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规律。进一步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从整体上说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严格地讲是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因为在这一阶段上,人们还保留着土地公有制和共同劳动等原则,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物质援助下,这些原则可以与发达的物质生产力相结合,从而跨越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5]列宁后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提出了民族殖民地理论,为广大落后国家进行革命指明了方向。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标志着农村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此次改革及此后的1905年及1917年2月革命,进一步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语境中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第313页。

[5]王力军、胡瑾:《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济南〕《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内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激化,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有利时机,于1917年十月取得俄国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俄国不是从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依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中国,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一战”期间获得了短暂繁荣,但却没落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前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制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总之,无论是在制度上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俄国,还是实现了制度上跨越的新中国,1917年后的俄国以及1956年后的中国,由于其社会主义是分别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因而,生产力水平不仅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巨大差距,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依据,那就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积累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跨越。

二、中俄历史检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方法

理论上,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恰恰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而“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1]。中俄两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依据各自国情、条件,曲折发展出了各自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但遗憾的是,苏联没有将自己的方式方法一以贯之。

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后坚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有利于国计民生原则,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他还提出,“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2];“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4]毛泽东这一系列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新中国生产力的方式方法观点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也是列宁思想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经也认为,新中国必须借鉴新经济政策做法,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5]而1953-1956年进行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6]。由于受“左倾”急躁冒进思想影响,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尚未结束,1956年8月的中共“八大”便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从而,刚刚起步不久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被过早中断,社会主义建设接下来进入了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2-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5][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第326-327页。

的、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进程,直至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至此,历史发展进程再次回到“原点”——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加拿大客人时,说道,“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从而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它们与社会制度之间无本质的必然联系。“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3]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谈话”最终厘清了“姓资”、“姓社”问题,打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禁区。至此,中国,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理论上,都明确了借鉴和利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式方法。

20世纪初的俄国,尽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帮助俄国渡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和克服了来自内战的威胁,但制定这一政策“也有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即将它作为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施路径的考虑。”^[4]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牺牲了农民利益,动摇了工农联盟,造成了俄共(布)执政的阶级基础分裂的危险。面对困境,列宁意识到,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不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社会主义”^[5]。由此可见,鉴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的现实,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尚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采取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迂回”过渡方法。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便是这种“迂回”过渡方法的直接体现。

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不到3年,1924年列宁过早地去世,此后俄共(布)便放弃了这一政策。1924年5月的俄共(布)十三大提出,把私人资本从商业范围内排挤出去。1929年底,俄共(布)宣布全面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至此,新经济政策被完全中止。斯大林时代,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国有企业和消除公有制的低级形式—集体农庄。虽然工业化使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日常生活必需品匮乏;而依附于工业化的农业集体化,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命令方式甚至用武力手段强迫富裕农民和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不仅造成了农民死亡现象,而且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由此看来,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完全超越了当时苏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第364页。

[4]刘诚、陈晓梅:《论十月革命后苏俄多党合作实践的终结——基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影响的视角》,〔上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5]《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试图通过缩短过渡期的办法使苏联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的做法不可行。198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以来,其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但追根溯源,主要还是苏共当年没有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贯彻到底,过早地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实施过程,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不牢,从而埋下了最终失败的隐患。”^[1]

三、中国经验: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创新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 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1992年以来,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阶段。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五大,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设计。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则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看来,中国在不断探索着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认识上的“相克”到实践结合上的“相生”,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高度概括,也为今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定了方向。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扫清了思想障碍和理论障碍。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下,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上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道路指导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自2011年超过日本以来,已经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

2. 在创新社会主义发展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通过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创新社会主义发展,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迂回”路径,并非要退回资本主义,也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更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而是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利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壮大公有经济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在俄国,新经济政策实际是“退让”或“迂回”政策,其目的是利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正常的工农经济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夯实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基础。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实质就是一定程度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面对千百万的小生产者,完全废除和禁止私人交换式的商品经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所以,列宁认为,通过国家监督与计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以此创造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最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不会使苏维埃经济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

[1]杨长鑫:《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南京〕《唯实》2012年第2期。

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1]更重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命脉以及国家机器,国家资本主义的实施更不会使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2]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俄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要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但改革开放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3]改革开放中,只要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再陷入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只要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会退回到资本主义。

在中国,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还必须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影响,不断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以来诞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个人主义至上,推行经济上的自由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鼓吹政治上的宪政民主等是其核心内容,其政策主张典型表现形式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明显地带有政治倾向与政治目标,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因而始终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反映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其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等只不过是它用来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5]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我国渗透,试图左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6]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非是想借助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契机,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并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责任编辑:曾逸文]

[1]《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页。

[2]《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第372页。

[5]高和荣:《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北京〕《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